

从若干回鹘文献的缀合看敦煌吐鲁番文献流散的另一路径^①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阎婷婷

内容提要：国内外各地收藏的回鹘文文献其实皆为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北京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台北傅斯年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多地收藏的回鹘文文献可以缀合，呈现出其不同的流散路径。敦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的缀合研究不仅可以立体地呈现这些文献的具体内容，亦可对全面认识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流散路径提供材料依据，丰富以往敦煌吐鲁番文献流散情况的认识和结论。

关键词：回鹘文文献 文献缀合 敦煌吐鲁番文书 流散路径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24) 03—0092—13

DOI:10.16363/j.cnki.xyyj.2024.03.008

一 导论

1900年6月，王道士及其伙计杨某发现藏经洞后不久，王道士开始将部分书法精美的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达官贵人，其中有驻扎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敦煌知县汪宗翰等，经此一环又流散至张广建、许承尧、杨炳荣、叶昌炽、端方、苏子培、陆季良等人手中，^②自此，藏经洞的发现被世人所知，斯坦因（A. Stein）、伯希和（P. Pelliot）、橘瑞超、奥登堡（S. Oldenburg）等大批所谓的“探险家”踏足敦煌搜罗文物。

1907年，斯坦因带着翻译蒋孝琬来到敦煌，从王道士处购得24箱写本和5箱绢画等，其中经卷8082件，木板印刷品20卷。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时，途经敦煌，再获写本570余件。^③斯坦因收集品现藏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1908年，伯希和来到敦煌，仅用500两银子换得藏经洞写本中的上乘之作。^④伯希和所获写本现分藏在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和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其中回鹘文写本总数约有400个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YJA740001）的阶段性成果。

②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3～67页。

③ 周劲思：《斯坦因与敦煌文物的流失》，《华夏文化》2003年第3期，第12页。

④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71～79页。

编号。1909年8至9月间，伯希和先将所获写卷送回法国，后从河内到北京购书，并将随身携带的敦煌文献交给京城学者观看。罗振玉等得知敦煌仍有很多文献时，提请清政府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购买余卷，运回北京。何彦升运送这些敦煌文物时只用席子捆起，装在大车运往京城，但沿途大小官吏层层偷盗，至京时只剩8679件。何彦升等人为凑足原先数量，将较长或看似不甚重要的卷子撕成两半，送交京师图书馆。^①另外，清廷运走残余写卷以前，王道士已经偷偷藏了一些写卷，当1911~1912年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1915年奥登堡，1914年斯坦因再次造访敦煌时，从王道士手中又购得可观的写卷。直至1920年，王道士似对外阜探访者不再热情。1923~1924年，华尔纳造访敦煌时没能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写卷，1925年，当陈万里、华尔纳再访时，王道士则拒门不见。此外，德国探险队在1902年至1914年间曾对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先后四次考古挖掘，并对柏孜克里克等洞窟进行了考察，劫掠了大量纸质文献和壁画，大部分现藏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Turfanforschung at the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历经几度劫难，大批敦煌吐鲁番文献流失海外，其间也包含大量珍贵的回鹘文文献。近几十年，世界各地藏回鹘文文献已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中也不乏写本缀合情况的考察。百济康义曾对巴黎、斯德哥尔摩和京都等地藏可以缀合写本进行了深度分析，^②茨默（Peter Zieme）^③、张铁山^④、拉史曼（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⑤等学者也曾对具体文献的缀合情况进行考证，但回鹘文文献缀合研究的总体进展相当有限，亟待进一步关注和阐释。^⑥

二 回鹘文文献的缀合

近年，学界在考证回鹘文献时，发现了不少可以缀合的写本残片，提升了回鹘文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揭示敦煌吐鲁番文献流散至世界各地的一条新路径。通过考察国内外各地所藏回鹘文文本的纸张、装帧、尺寸、行数、栏线等形制特点，页码、页眉、字体、字迹等书写特征及主要内容、翻译风格和词根与附加成分的搭配等，笔者最终确定了以下6种存在链接缀合关系的回鹘文文献，具体如下：

1. 《各种缘起》（《西夏回鹘文书断简》第18叶右面 + Peald 6a）

大理图书馆藏回鹘文“各种缘起”刻本8件，其中《敦煌遗片》第5~7叶左右两面各贴1

① 窦侠父：《敦煌学发凡》，新疆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35页。

② 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記〈別訳雑阿含経〉断片—“Pelliot Ouigour 218”の意味すること》，《仏教学研究》1990年，第45・46号，第99~124页。

③ Zhang Tieshan & Peter Zieme, “An Old Uigur Version of the *Kasibhāradvāja Sutta* Extended by a Poe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72 (2), 2019, pp. 179-206.

④ 张铁山：《敦煌出土回鹘文〈无量寿经〉残页研究》，《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第64~68页。

⑤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Cataloguing the Säkiz Yükmäk: New Results”,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ld Uighur Studies in Memory of Şingko Şeli Tutung from Beşbalık*, Ankara, 2022, pp. 203-219.

⑥ 近期，笔者与孙斌涵合作确认，柏林藏9件回鹘文《长阿含经》写本可以缀合。见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孙斌涵：《柏林藏回鹘文〈长阿含经〉研究》（待刊）。另，关于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的缀合情况，见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慈恩传〉研究》，《写本学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114~1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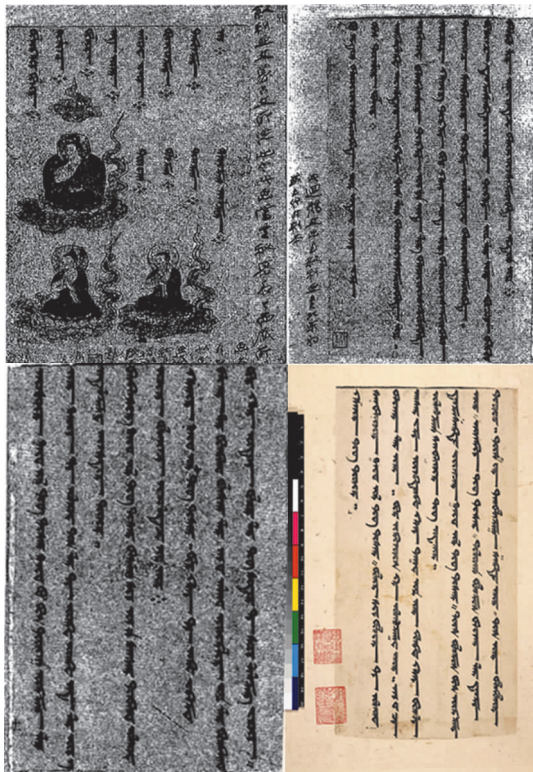


图1 《西夏回鹘文书断简》第6叶右 + 第18叶左 + 第18叶右 + Peald 6a 01

起残缺的后续部分。经笔者比对，缀合情况如下：

《西夏回鹘文书断简》p. 18 右面 62-64 kšanik qayu ol tep tesär: bir kšan-ta iki y(i)g(i)rmi bavang-lar birgärü bol-sar-lar: azu alqu etiglig nom-lar birgärü bir kšan ödtä bolur-lar tep sudur-ta sözlämäk-intin: ^{Peald 6a 01} kšanik tep tetir :

译文：62-64) 若问何为刹那，因为经典中说：一刹那中十二有支俱有，或是一切有为法在一刹那间俱有，01) 所以才叫作刹那。

2. 《华严经·十地品》(H No. 36V + 188171_a34)、《华严经·十定品》(188171_a11 + H No. 83)

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收藏多件回鹘文文献，编入册子《西史 H. A. “回鹘文佛经”》中，共 18 纸，其中 14 纸为《华严经》，折本，正反两面书写，188171_a01 书有“畏兀儿文，西史 H. A. 1-14 张；15-17 残页；另残页一张；另残字两小块”等字。^② 百济康义、小田寿典曾研究刊布羽田

件，共 6 件（第 5 叶左、右，第 6 叶左、右，第 7 叶左、右），《西夏回鹘文书断简》第 18 叶有 2 件（第 18 叶左、右）。文献原纸被裁剪后粘贴于衬纸上，鉴于原纸与衬纸接缝处钤有张大千印章，可确定裁剪人无疑是张大千。该文献原为折本，一纸四面，被裁剪后一纸变四页，裁剪处隐约可见上下边栏，一页 8 行，每页尺寸为 24 × 15 厘米。《敦煌遗片》第 6 叶左面左下角刻有数字“十”，《西夏回鹘文书断简》第 18 叶右面左下角刻有数字“十一”，为原折本的页码。^① 百济康义根据文献中的页码和内容确认了文献的前后顺序，并判断原折本尺寸为 1 尺 × 2 尺，各页顺序如下（图 1）：

第一纸：第 7 叶左面 + 第 7 叶右面 + 第 5 叶左面 + 第 6 叶左面（页码为“十”）；

第二纸：第 5 叶右面 + 第 6 叶右面 + 第 18 叶左面 + 第 18 叶右面（页码为“十一”）。

该刻本内容讲解“十二缘起”和“五种缘起”，其中天理图书馆藏本存“分位”“远续”和“刹那”三个缘起的内容，但“刹那”缘起部分残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本则恰为“刹那”缘

① 根据文献中的页码“十”“十一”，百济康义断定，该文献前面定有讲述“各种缘起”的 9 纸 36 面 280 行左右的内容。见百济康义：《天理图书馆蔵ウイグル語文献》，《天理圖書館報ビブリア》1986 年第 86 号，第 172 ~ 148（逆顺）页。

② 郑阿财：《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综论》，《佛学与文学——佛教文学与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8 年，第 389 ~ 390 页。笔者最早对这部分文献的属性进行了考证，详见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安藏与回鹘文〈华严经〉》，《西域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74 ~ 86 页；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安藏·ウイグル語訳〈華嚴經〉の翻訳法について》，《国語国文》2015 年第 84 卷第 5 号，第 1 ~ 21 页，本文不做赘述。

亨所收藏的《八十华严》照片，共 18 张，文献的拍摄地和收藏地点不详，但内容分属《十地品》和《十定品》，物理特征与傅斯年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及兰州范军澍收藏本相一致，原件无疑为折本。傅斯年图书馆亦存有以上二品的写本，行数、页眉等特征一致，且内容可以缀合，如：《华严经》第 38 卷“十地品第九地”一段中，H No. 36 背面以 *barča-nī činīnča kertüsinča* “一切都真实”结束，傅斯年图书馆藏写本 188171_a34 则以 *bilir-lär* “知道”开始，对应原文的“皆如实知”；《华严经》“十定品”一段：傅斯年图书馆藏写本 188171_a11 以 *üč mǐng uluγ mǐng yertinčü-lär-ning parmanu-larī sanīnča yertinčü-lärig yaltürtur* 开始，相缀合的 H No. 83 正面以 *-lar birär birär yertinčü içintä* 相接，对应原文的“照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世界，一一世界中”。

羽田氏所藏照片与傅斯年图书馆藏品相缀合，说明以上两地收藏回鹘文《华严经》来自一处。傅斯年图书馆部分藏品购自北京庆云堂书店，据信来自李盛铎，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李盛铎出售的敦煌写本目录，曾出售于日本某人，鉴于羽田亨私藏的部分照片正好与这部分目录吻合，表明“这批写本售于日本时，羽田亨曾加以研究”，可能也来自李盛铎私藏。^① 另外，甘肃省博物馆、兰州范军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杭州庐江草堂及傅斯年图书馆藏品在形制上亦有共同点：折子式、一纸四面、楷书体、天地有红色边线、同一品之页眉格式和行数相同。可得出结论，以上不同地区收藏的写本应同属一源，均来自敦煌莫高窟。

3. 《阿毘达磨俱舍论》（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 28V + 国家图书馆 GT 15-58）

回鹘文《阿毘达磨俱舍论》（简称《俱舍论》）收藏在斯德哥尔摩、京都、兰州、北京、杭州等地，其中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of Ethnography, Stockholm）藏 16 叶，藤井有邻馆、甘肃省博物馆、杭州庐江草堂各藏 1 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 叶。

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本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贝格曼（F. Bergman）在西北地区考察时所获。百济康义曾确认其属性，但未能发布研究成果，后由庄垣内正弘刊布。^② 笔者近期在考察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文献时，发现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回鹘文《俱舍论》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可以缀合，即斯德哥尔摩本 28V 之第 63 行以“*turyurur čxšapt törü qavramaq-ıγ tep 答 bar adın baxšī*”开始，国家图书馆本 GT 15-58 则以“-lar sözlär antrabav-ta turduq-ta tep”开始，对应原典的“有余师说住中有中”，其中对应“余师”的 *baxšīlar* 一词的 *baxšī* 书写在斯德哥尔摩本 28V 第 63 行之末，而其复数附加成分 *-lar* 则写在国图本中 GT 15-58 第一行之首。^③ 此外，以上五处回鹘文《俱舍论》写本在贝叶型、尺寸、朱色上下边栏、穿绳用红色圆线、行距、界高、字体（楷书）等方面保持一致，无疑是出自敦煌莫高窟，因种种原由散落于各处的同一文献。

4. 《入阿毘达磨论》注释（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 1935. 52. 22V + 国家图书馆 GT 15-27）

回鹘文《入阿毘达磨论》（简称《入论》）注释书分藏在斯德哥尔摩、京都、圣彼得堡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地，数量达 20 件。百济康义曾研究斯德哥尔摩本和羽田亨收藏的照片。据他介绍，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收藏写本 4 叶，羽田亨收藏照片 3 叶。百济当时确认其

① 荣新江：《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 年第 2 期，第 3 页。

② 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記〈阿毘達磨俱舍論〉初探——藤井有鄰館所藏断片》，《龍谷大學論集》第 425 号，1984 年，第 65～87 页；Masahiro Shōgaito, *The Uighur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Preserved at the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tockhol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③ Masahiro Shōgaito, *The Uighur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Preserved at the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tockholm*, p. 64.

属性，但写本内容的研究成果未能正式发表。^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 11 件残片，由庄垣内正弘分两次刊布。^② 近期，他研究了斯德哥尔摩藏以上 4 叶写本，后经营原睦、大崎纪子、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藤代节整理，以共著者形式正式出版。^③

另外，笔者从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物中发现两叶回鹘文《入论》注释书残片，编号分别为 GT 15-03 和 GT 15-27。通过纸张、上下边栏、字体、笔迹及页眉等相关信息，可以断定 GT 15-03 与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品 1935. 52. 24，GT 15-27 与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品 1935. 52. 22 相互关联，为散落于两处的同一写本，其中 1935. 52. 22 与 GT 15-27 可以缀合（图 2），1935. 52. 22 背面第 44 行以“论曰 asanvar ärsär qaltı tuži”结束，GT 15-27 以 tuži “屠儿”的附属附加成分-lar 衔接，具体如下：

1935. 52. 22V 44 論曰 asanvar ärsär qaltı tuži- GT15-27 01-04 l[ar-ta] ulatı alqu käyikči-lär quš tuṭyuči-lar
balıq tutyuči-lar yol tosumči-lar buṭayı-luṭ + čı + küzäd + čı + -lär yatçı-lar it ät-in bişurṭyuči-lar toor-
[čı]r[]tdäči-lär čandal-lar “谓诸屠儿及诸猎兽、捕鸟、捕鱼、劫盗、典狱、缚龙、煮狗、置羶、魁脍”。^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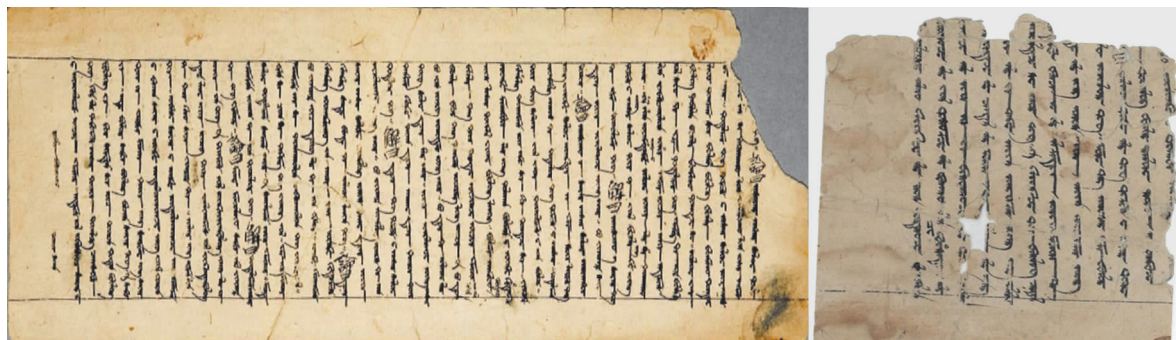


图 2 1935. 52. 22V + GT 15-27

5. 《妙法莲华经玄赞》（吉美博物馆 V-212 + H No. 75；吉美博物馆 V-226 + H No. 61）

回鹘文《妙法莲华经玄赞》（简称《玄赞》）分草书、楷书两种，其中楷书体一页 8 行写本

① 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收藏 4 叶文献原没有整理编号，百济编号为 H Ms. No. 21 ~ 24，其中 H 为 Hedin 之缩写，现编号为 1935. 21 ~ 24；羽田亨收藏照片编号分别为 H. Photo 20, 25, 28，其中 H 为 Haneda 之缩写。

②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入阿毘達磨論の注釋書斷片》，Fujishiro Setsu (ed.), *Approaches to Eurasian Linguistic Areas* (CSEL 7), Kobe City College of Nursing, 2004 年，第 271 ~ 295 页；庄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蔵のウイグル文〈入阿毘達磨論〉注釋書斷片》，久保智之，林徹，藤代節編《チュルク諸語における固有と外來に関する總合的調査研究》，九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言語學研究室，2009 年，第 91 ~ 128 页。

③ 庄垣内正弘等：《ストックホルム民族學博物館所蔵ウイグル文〈入阿毘達磨論〉注釋書斷片》，《ユーラシア諸言語の多様性と動態 - 20 号記念号 -》，Kobe City College of Nursing, 2018 年，第 1 ~ 68 页。

④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二叶回鹘文〈入阿毘达磨论〉注释书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21 年第 36 号，第 11 ~ 22 页。

收藏在斯德哥尔摩、巴黎、京都等三地。^① 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 (No. 41)、巴黎吉美博物馆 (No. 63322) 藏品和羽田亨收藏照片形制具有共同点, 皆为贝叶式, 楷书体两面书写, 每页 8 行, 有红笔天地栏线, 留穿孔圆线, 尺寸为 30 × 14 厘米, 表明三处写本实为散落在各处的同一写本。^② 此外, 百济康义确认吉美博物馆藏 V-212 与羽田藏照片 H No. 75, 吉美博物馆藏的 V-226 与羽田藏照片 H No. 61 可以缀合, 但他没有交代详细的缀合情况。经笔者整理, 以上两地写本的缀合情况如下:

V-212 Verso ll. 07-08 bešinč ardi temäk üzä ürkmäk balinglämək ol qayu tep tesär: qaltı birök bu nomuy
Haneda photo 75 ll. 01-04 [nomla]-sar umunč küvānč-lig-lār inčä tep tegäy-lār: näčükin [ardı] ärki atı kötrülmiş
bizni tep: kim ol umunč [kü] vānč-liglār kántü-läri teyür üçün yoluq qalırsız tolu tükäl qılu tükädtük-
biz tep:

“五诤惊怖, 谓若为说, 增上慢者作如是说: 云何如来诤于我等? 自谓道满更无余故。”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3: T34, no. 1723, pp. 707c3-4)

V-226 Recto 08 [ü] zälksiz iki adaγ-lıγ-ta ayaγuluq-a tep temäki Verso 01-08 [är] sär k[i]m tükäl bilgä t(ä)
ngri t(ä) ngrisi burxan iki adaq-lıγ [ü] küš adaq-lıγ adaqsız imärigmä qamaγ tñl(ı) γ oylan-ı [ara]-
sınta ayaγu-luq aγırlaγuluq y(a)rlıqar üçün: anın iki adaqlıγ-ta ayaγuluq-a tep temış ärür: kim bu iki
adaqlıγ üküš adaqlıγ adaqsız tegüči bu üç türlüg tñl(ı) γ-larta iki adaqlıγ-lar qamaγ-ta y[e]g [a]dr
[uq] tetir: tözün yol-ta kirgäli uyur üçün: [o]l qayu ol tesär: kiši-li t(ä) ngri-li-tä ulatı-
[lar teyür: tängri t] (ä) ngrisi burxan ymä iki adaqlıγ y(a)rlıqar [anın] bu üç bölük tñl(ı) γ-larta
barča-ta [] y(a)rlıqar üçün anın iki adaqlıγ-ta aya[γuluq]

“佛于二足多足无足一切中尊, 今云两足尊, 于三类中两足为贵, 能入道故。谓人天类, 佛亦两足, 故言两足尊。”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3: T34, no. 1723, pp. 708b6-8)

6. 《大乘无量寿经》(U 4672 + 80 TB I 596-2 + GT 15-35 + 80 TB I 596-1)

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存多种写、刻本, 仅柏林就藏 120 余件。^③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亦出土多件刻本, 张铁山刊布 B137: 2、B138: 10、B160: 6、B160: 12 等残片, 并确认 B160:

① 百济康义刊布了柏林、巴黎和斯德哥尔摩本的全文及羽田收藏照片中的 No. 73、No. 61 和 No. 34, 详见百济康义: 《ウイグル訳〈妙法蓮華經玄贊〉》(1), 《仏教学研究》1980 年第 36 号, 第 49~65 页; 百济康义: 《〈妙法蓮華經玄贊〉のウイグル訳断片》, 護雅夫编《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 山川出版社, 1983 年, 第 185~207 页; Kudara Kōgi, “Uighurische Fragmente eines Kommentars zum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Jens Peter Laut and Klaus Röhrborn, eds., *Der Türkische Buddhismus in der japanischen Forschung*, Wiesbaden, 1988, pp. 34-55; 百济康义: 《ギメ美術館所蔵〈妙法蓮華經玄贊〉ウイグル訳断片》, 《龍谷紀要》1990 年第 12 卷, 第 1~30 页。新发现国家图书馆藏本由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刊布, 见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妙法蓮華經玄贊〉研究》, 《文津学志》2019 年第 12 辑, 第 317~321 页。

② 百济康义: 《ギメ美術館所蔵〈妙法蓮華經玄贊〉ウイグル訳断片》, 《龍谷紀要》1990 年第 12 卷 (第 1 号), 第 1~30 页。

③ 原由拉德洛夫 (W. W. Radloff)、阿拉提 (R. R. Arat)、茨默等学者研究, 见 W.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Materialien nach dem Tode des Verfassers mit Ergänzungen von S. Malov herausgegeben*, Leningrad, 1928, pp. 148-151; R. R. 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65, pp. 216-223; Peter Zieme, “Uigurische Sukhāvāṭīvyūha-Fragmente”,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2, 1985.

6 和 B160: 12 可以缀合。^①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则刊布有关《大乘无量寿经》的跋文 B464: 142 + B157: 12。^② 最近,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则出版其集成,^③ 并与克努普 (M. Knüppel) 合作进行了档案化。^④ 根据相关跋文, 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似译自藏文, 柏林藏 U 4648 的开首部分不仅提到了该经的梵文名, 亦提到其藏文名 (pakičpa se irpagtu metpa še piyaua čenpo yi imto), 足见译者精通藏文。据跋文所记, 该文献曾印刷 110 部 (跋文 U 345), 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作为同一雕版印刷, 广为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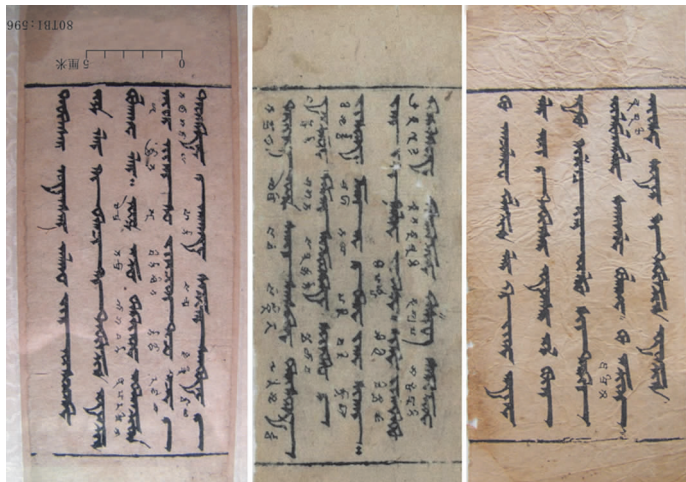


图3 80 TB I 596-2 + GT 15-35 + 80 TB I 596-1

笔者近期发现国家图书馆藏一页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 编号 GT 15-35, 竖长型黄色纸张, 楷书体刻印本, 上下有粗线黑色边栏, 共 5 行, 行间的梵语陀罗尼用婆罗米文注音, 其形制与圣彼得堡、柏林藏刻本相同, 应来自同一雕版。此外, 吐鲁番学研究院另藏两页刻本 (80 TB I 596-1、80 TB I 596-2), 20 世纪 80 年代出自柏孜克里克, 由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刊布。经笔者考证, 吐鲁番学研究院所藏以上两页与国家图书馆藏刻本 GT 15-35 可以缀合 (图3),

表明 GT 15-35 出自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此外, 柏林藏 U 4672 从上下文可与 80 TB I 596-2 相衔接, 但从 U 4672 可以看到后一页后续残缺的 udunsar “若供养” 一词, 而 80 TB I 596-2 并不残缺, 故 U 4672 与 80 TB I 596-2 虽可衔接, 但并不缀合, 应该是同一雕版的不同印本。鉴于该国家图书馆写本至今尚未正式刊布, 故在此为学界提供较为详细的文献转写、汉文译文及汉、梵原文。

【U 4672】

05 kimlär bu nomuγ ayasar ayır[lasar]

【80 TB I 596-2】

01 tapınsar udunsar alqu yeg üstünki

02 nomlarqa barçaqa tapınmış udunmiş

03 bolγaylar: oom namo bagavate aparamita

04 ayur niyana su vini čita tečo račaya

① 张铁山:《敦煌出土回鹘文〈无量寿经〉残页研究》,《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第64~68页。

②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回鹘文雕版印刷密宗文献概述》,张定京等主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80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9页。

③ Abdurishid Yakup, *Altıgürische Aparimitäyus-Literatur und kleinere tantrische Texte* (BTT 36), Brepols, 2016, pp. 47-123.

④ Abdurishid Yakup and Michael Knüppel,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1, 2007, pp. 95-151; Abdurishid Yakup,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5, 2009, pp. 182-194.

05 tatagadaya arhade samyak sanbudaya

【GT 15-35】

01 tatyada oom sarva sanskari parišutda

02 darmate gagana samutgade suvabau-a

03 višutda maxanay-a parivare svaxa

04 yānā inčā qaltī vibaše šiki višbabu

05 kirakušinde kanakamuni kašip šakimuni

【80 TB I 596-1】

01 bu ančulayu kälmišlärkä yeti ärdini-

02 lār üzä tapınsar udunsar ol buyan

03 ädgi qılınčnıng ülgüsin tängin

04 ülgülägäli sanağali bolğay: amita :

05 ayuše sudurqa tapınmıš udunmıš

【译文】

^{U 4672 05} 若有人能尊重并供养此经，^{80 TB I 596-2 01-03} 等同于供养所有最胜佛法。

^{80 TB I 596-2 03-05} (陀罗尼咒:) 南谟薄伽勃底 (一) 阿波唎蜜哆 (二) 阿喻訖硯娜 (三) 须毘伽
悉指陀 (四) 啰佐耶 (五) 怛他羯他耶 ^{GT 15-35 01-03} (六) 怛侄他唵 (七) 萨婆桑悉迦啰 (八) 波
唎输底 (九) 达磨底 (十) 伽迦娜 (十一) 莎诃某持迦底 (十二) 萨婆婆毘输底 (十三) 摩诃
娜耶 (十四) 波唎婆囉莎诃 (十五)。^{GT 15-35 04-05} 此外如同: 毘婆尸佛、尸弃佛、毘舍浮佛、俱留
孙佛、俱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80 TB I 596-1 01-04} 若有人用七宝供养如来, 其功德可以
计量。^{80 TB I 596-1 04-05} 若供养无量寿经, (其功德不可限量)。

【汉文原文】

若有能供养是经者, 则是供养一切诸经等无有异。陀罗尼曰:

南谟薄伽勃底 (一) 阿波唎蜜哆 (二) 阿喻訖硯娜 (三) 须毘伽悉指陀 (四) 啰
佐耶 (五) 怛他羯他耶 (六) 怛侄他唵 (七) 萨婆桑悉迦啰 (八) 波唎输底 (九) 达
磨底 (十) 伽迦娜 (十一) 莎诃某持迦底 (十二) 萨婆婆毘输底 (十三) 摩诃娜耶
(十四) 波唎婆囉莎诃 (十五)。

如是毘婆尸佛、尸弃佛、毘舍浮佛、俱留孙佛、俱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
佛。若有人以七宝供养, 如是七佛, 其福有限, 书写受持是无量寿经典, 所有功德不可
限量。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 册, No. 936, pp. 84b03-12)

【梵文原文】

idam aparimitāyuh-sūtram satkṛya pjaiṣyati | tena sakala-samāpta-sarva-dharma-pūjitaṁ bhaviṣya-
ti) ||

om namo bhagavata) aparitāyur)-jñāna-suviniścita-tejo-rājāya, tathāgatāyārhate) saṃyuk-saṃ
buddhāya) tadyathā om sarva-saṃskāra-pariśuddha-gharmate gagaṇasamudgate svabhāva-viśuddhe
mahānaya-parivāre svāhā

yathā vipaśyi) -śikhi-viśvabhū-krakucchanda kanakamuni-kāśyapa-śākyasiṃhas tathāgatās) teṣam tathāgatānām sapta-ratna-paripūrṇām) argha-pūjaṃ kṛtvā yāvat) tasya puṇya-skandhas pramāṇam) śakyam gaṇayitum | na tv) aparimitāyuh) -sūtrasya……①

三 回鹘文文献的流散

百济康义在研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收集品 Pelliot ouigour 218 时，关注到不同地区所藏回鹘文献之间的关联性。经其研究发现，法国国立博物馆（No. 218）和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No. 12 ~ 15）藏《别译杂阿含经》，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No. 9 ~ 11）、藤井有邻馆（No. 10）藏《杂阿含经》，羽田藏照片（No. 44 ~ 75）、吉美博物馆（No. 63322）和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No. 41）藏《妙法莲华经玄赞》写本，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No. 25 ~ 40）、藤井有邻馆（No. 16）、甘肃省博物馆（No. 10561）藏《阿毘达磨俱舍论》，羽田亨所藏照片（No. 26）及藤井有邻馆（No. 8）藏《阿毘达磨顺正理论》写本，羽田亨收藏照片（No. 20、25、28）和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入阿毘达磨论注释》写本（No. 24）等在纸张、边栏、字体、字迹、行数等形制特征和内容上具有共同特点，应为散落于各处的同一文献。^② Pelliot ouigour 218 隶属于“Pelliot ouigour Grotto 181”文件下，而所谓“Pelliot ouigour Grotto 181”即为伯希和 181 窟，即现在的 B464 窟。据此，百济康义认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和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别译杂阿含经》写本，以及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和与其相关联的藤井有邻馆、吉美博物馆、羽田藏照片等回鹘文献皆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元代洞窟 B464 窟。

笔者同意以上推断，但元代回鹘文文献并不局限于 464 窟一处。1988 年至 1995 年，敦煌研究院对敦煌莫高窟北区 248 个石窟进行了 6 次考古发掘，其中出土回鹘文文献的洞窟多达 38 个，较为完整的回鹘文写本达 128 件，木活字 48 枚，^③ 碎片 1241 片。^④ 笔者曾研究 B157 窟出土的一叶两面回鹘文《增一阿含经》残片，编号 B157: 17，其主要特点为草书体，残损严重，正背两面各仅存 6 行，其最大特征为其夹写汉字具有规律，只取一行韵文中的第一个汉字。同时，其翻译特点与其他回鹘文《阿含经》皆采用节选翻译模式，即“节译”不同，B157: 17 采用完整翻译模式，即“全译”。这种特点在回鹘文《阿含经》文献中实属罕见。巧合的是，国家图书馆藏 GT 15-26 与 B157: 17 具有相同的特点。该文献原由张铁山刊布，但未能发现其“全译”特点，也未注意到“夹写汉字”的规律。综上，笔者相信以上两个文献应属分散于两处的同一文献，不仅可以证明 GT 15-26 来自莫高窟北区 B157 石窟，同时亦表明，元代回鹘文文献并非皆来自莫高窟 464 窟，亦来自莫高窟北区元代不同洞窟。以上回鹘文文献的缀合情况及同一文献流散至不同地域为窥见敦煌吐鲁番文献之流散路径提供了可能。

① Walleser, Max, *Aparimitāyur-jñāna-nāma-mahāyāna-sūtram, nach einer nepales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 mit der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Version,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2, Heidelberg: Carl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916, p. 24.

② 百济康義：《ウイグル記〈別訳雜阿含經〉断片—“Pelliot Ouigour 218”の意味すること》，《仏教学研究》第 45・46 号，第 99 ~ 124 页。

③ 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 B119: 13 号文书系回鹘文书》，《敦煌学辑刊》2005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④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343 页。

众所周知，斯坦因曾两度来敦煌，时间分别为1907年和1914年，他从王道士那里购得大量写卷。从其所获文献来看，写卷也并非局限于藏经洞。比如，斯坦因1907年所获回鹘文《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Or. 8212. 75）属于元代写卷，共7015行，现藏大英图书馆，应出自伯希和所谓181窟或182窟，是王道士从莫高窟北区搜罗而来。^① 幸运的是，该《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写本没有分散，纸张也没有撕裂等现象，是整体出售给斯坦因的，随后更是一页不漏地收藏在伦敦一地，而后期的敦煌写卷则没有如此幸运。

前述王道士早期将部分文书送予敦煌一带的达官贵人，其中送给廷栋的部分文物后被甘凉（今张掖）道尹许承尧所得，后续又分批出售，现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等处。^② 王道士送给同乡汪宗翰的写卷中，有一部分由汪宗翰又送给其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1849～1917年）。叶昌炽于1914年开始出售所藏碑拓，被嘉业堂和聚学轩所得。^③ 在叶氏1917年过世后，部分藏品流出，归福州梁氏，被浙江吴兴蒋汝藻的传书堂所有，后于1925年出售，归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④ 何彦升受命押运北京的剩余文物和写经残卷经遭受沿途乃至京城官吏的劫掠，在从甘肃运回京城学部后，何彦升、李盛铎、刘廷琛、何震彝等人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盗取大量珍贵写卷。^⑤ 如李盛铎出售日本某人的敦煌写本，流散至日本多地，羽田亨曾对其进行拍照和研究，但后期则不知所终。羽田所藏照片中，回鹘文《华严经》可与傅斯年图书馆藏本缀合，估计二者同为李盛铎所盗藏品。从这一点讲，羽田所藏回鹘文《八十华严》照片并非为吉川拍摄于吐鲁番之物。羽田所藏照片共75枚，其中回鹘文文书72枚。据百济康义、小田寿典等学者在相关论文中交代，其出土地以及现阶段所藏地不详。笔者推断可能的储存地为大阪杏雨书屋。

基于国家图书馆藏《维摩诘经》等同为李盛铎旧藏品，表明部分李盛铎藏品曾留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且撕成多件，可以缀合，进一步证实了李盛铎等人在预留了部分有价值的写卷之后，将自认为并不重要或较为重复的写卷撕裂，以便充数。^⑥ 国家图书馆藏两叶回鹘文《华严经》纸张残缺严重，有被人为撕开的痕迹，这一点与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地所藏回鹘文《华严经》完整写本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否为李盛铎等人所为则不得而知。

王道士呈送给廷栋、汪宗翰等官吏的写卷也与前述伦敦藏《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一样，是王道士从莫高窟北区搜罗而来，后经过多种渠道和多人经手辗转来到北京、杭州、台北、京都、大阪等地。张大千1931年初到敦煌，同年王道士过世。二人是否有幸得见不得而知，但张大千似乎受到王道士搜罗文献成果的极大鼓舞，除进行临摹以外，亦从莫高窟北区挖掘获得不少

①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アビダルマ論書の文献学的研究》，京都：松香堂，2008年，第5页。

②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58页。

③ 荣新江：《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51页。

④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60～63页。

⑤ 荣新江：《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3页。

⑥ 张磊，周思宇：《从国图敦煌本〈维摩诘经〉系列残卷的缀合还原李盛铎等人窃取写卷的真相》，《文献》2019年第6期，第24～36页。

精美经卷，其中部分珍贵文献流散至普林斯顿、奈良等地。^①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收藏83件以Peald编号的敦煌遗书。^② 据称，罗寄梅（James C. M. Lo）与其妻子刘先（Lucy Lo）于1943至1944年间在莫高窟进行照相作业时从张大千处获得这些文献，并于上世纪80年代赠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松井太考证出该馆藏回鹘文占卜术《玉匣记》（Peald 6c~6i）可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残片B157: 54-2缀合。^③ 荒川慎太郎亦证实该馆藏西夏文《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与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藏和敦煌莫高窟北区B157窟出土西夏文《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残片可以缀合。^④ 这表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天理大学图书馆藏部分文献来自敦煌莫高窟北区B157石窟。

天理图书馆藏《敦煌遗片》（No. 550）中有张大千如下题跋：“西夏残经癸未岁得于敦煌石室壬辰秋日装成蜀郡张大千”。^⑤ “癸未”即为1943年，当值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临摹石窟壁画时段，而“敦煌石室”即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元代洞窟。^⑥ 张大千将这些文献裁剪粘贴在衬纸上，并压印章作题跋。文献的装订时间“壬辰”实为1952年，系画家在东京办展期间出售。《敦煌遗片》背面亦写有1955年天理教二代真柱中山正善赠与之事，表明该系列文献系张大千于1943至1952年间出售至对方。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与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各种缘起》写本亦可以缀合，进一步确认其与张大千的关联以及文献的流散过程。

傅斯年图书馆藏回鹘文《华严经》“十地品”“十定品”与羽田藏照片相缀合。此外，傅斯年图书馆藏蝴蝶装写本在纸张、字体、页眉等形制特点与内容方面与甘肃省博物馆藏品、敦煌研究院、兰州范军澍收藏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品、国家图书馆藏品等保持相同特质，应出同一写本。傅斯年图书馆部分藏品有张大千的题记（如：188104），部分藏品属西北科学考查团向达等部分成员购自敦煌（如：188080），部分收据表明购自北京的庆云堂书店，据信来自李盛铎，而回鹘文《华严经》（编号188171）之出处则没有可靠记述，但与李盛铎关系密切的羽田所藏照片相缀合这一点表明，傅斯年图书馆藏回鹘文《华严经》来自李盛铎的庆云堂出售品的可能性较大。

回鹘文《俱舍论》收藏地点涉及斯德哥尔摩、京都、兰州、北京、杭州等地。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本可与北京国家图书馆本相缀合，至少表明其收藏与中瑞西北考查团相关联，且出自敦煌。国家图书馆藏《入论》注疏GT 15-27亦可与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1935.52.22V缀合，其流散途径可能同于前文所述的《俱舍论》写本。1页8行形制的回鹘文《玄赞》写本分散至五处：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羽田所藏照片、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敦煌研究

①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回鹘文〈各种缘起〉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21年第一辑（总第十五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第89~98页。

② Peald应为Princeton East Asian Library, Dunhuang and Turfan之缩写。

③ 松井太：《敦煌出土のウイグル語曆占文書：通書〈玉匣記〉との関連を中心に》，《人文社会論叢》2011年第26期，第25~48页。

④ 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蔵西夏文仏典断片（Peald）について》，*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83, p. 8。

⑤ 百济康義：《天理図書館蔵ウイグル語文献》，《天理図書館報ビブリア》1986年第86号，第179页。

⑥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院,其中吉美博物馆藏本和羽田所藏照片可以缀合,而羽田所藏照片与李盛铎的关系及写本的缀合情况,表明吉美博物馆藏回鹘文《玄赞》来自敦煌,与李盛铎有一定关联。

国家图书馆藏部分文献来自吐鲁番,其中一部分写卷可能来自梁素文藏品。梁素文原为新疆财物清理官,又名梁玉书,在新疆履职期间收集了大量珍贵写卷,其所藏品经出售后流散至世界各地,东京书道博物馆、静嘉堂文库、大阪杏雨书屋皆藏有梁素文收集品。^①小田寿典曾刊布一件回鹘文《观音经》残卷。据小田介绍,该文献照片于1991年获自京都,但没有提供收藏地等其他信息,只提及该文献与羽田亨相关联。^②残卷装入《回鹘文写经残卷》的文件包中,包首题签“吐鲁番出土”“素文珍藏”,可知梁玉书珍藏吐鲁番文献,该卷子编号“No. 10”,存跋文:

右回鹘文残经,出吐(鲁)蕃,为素文先生获于新疆者。

曩见法国人柏希和所得敦煌石室回(鹘)文经卷,如巨侠云。当时购于新疆,论斤计直。柏君乃膺载归于巴黎,至可惋惜。今素文犹得宝,此残经不至于归域外,亦大幸事也。甲寅五月,惇融並志。^③

此处的“甲寅”年应为1914年,“素文”指“梁素文”,“惇融”则指“罗惇融”,似经过“惇融”之手。笔者认为该回鹘文《观音经》残卷应为由羽田亨所拍摄的杏雨书屋收藏品,出售时间晚于1914年。京都藤井有邻馆收集品“羽561号”的包首题签:“唐时物价单残纸,吐鲁番出土,素文珍藏”,证明有邻馆也有梁素文获自吐鲁番的写本。

近期,余欣、王素、荣新江等学者发现,首都博物馆也存有梁素文藏品。据称梁素文部分藏品于1964年售于国家历史博物馆。^④国家图书馆部分藏品也与梁素文有关。如:《畏兀儿写经残卷》(编号为BD15370),书写于汉文《贤愚经》背面,根据陈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写给袁复礼的信札,《畏兀儿写经残卷》原属于“素文珍藏”,出于高昌故城。本文研究的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GT 15-35)可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80 TB I 596-1、80 TB I 596-2相缀合,表明GT 15-35来自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应亦为梁素文收集品。

国家图书馆尚藏有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阿弥陀经》等写本,皆为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5年)成员袁复礼先生在新疆考察时在乌鲁木齐购得。据称《慈恩传》于1930年左右发现于吐鲁番。最初持有者出于经济目的,将其撕开分散出售,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⑤而《阿弥陀经》之来源无疑同《慈恩传》一致,因为其收藏地完全同于《慈恩传》,应同为袁复礼购自《慈恩传》的拥有者,或许出售《慈恩传》和《阿弥陀经》的所谓“商人”为同一

① 荣新江:《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9~25页。

② Juten Oda, “A Fragment of the Uighur Avalokiteśvara-Sūtra with Notes”, in R. E. Emmerick, W. Sundermann, I. Warnke and P. Zieme, eds.,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äge der Tagung ‘Annemarie v.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c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 - 12. 12. 1994), Berlin, 1996, pp. 229-244.

③ 小田寿典:《トルコ語〈観音經〉写本の研究——付編旧〈素文珍藏〉写本断片訳注》,《西南アジア研究》第34号,1991年,第1~31页。

④ 余欣,王素,荣新江:《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8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166~174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藏94叶,编号以SI开头,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本共123叶,据说经伯希和介绍,吉美博物馆购自一个吐鲁番商人,现编号No. 47476。

人。他从吐鲁番某地发现以上两件文献，并将其带至乌鲁木齐，售卖给三位不同买主。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藤井有邻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吐鲁番学研究院等地收藏，且可以缀合的以上回鹘文文献，诠释着敦煌吐鲁番文献流散至世界各地的特殊命运。对这些文献进行对照和缀合研究，不仅可丰富其具体内容，亦可构建写本文献的流散路径。依笔者见，敦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除经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勒柯克等人劫掠外，还经历了以下几种路径：

1. 王道士除藏经洞外，还挖掘了北区石窟，获得一定数量文献，后呈送廷栋、汪宗翰等官员，其中部分从廷栋、汪宗翰处流散至许承尧、叶昌炽等处；2. 何彦升受命押运经卷至北京后，在学部由何彦升、李盛铎、刘廷琛、何震彝所盗，并出售；3. 梁素文获吐鲁番文献，并出售；4.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袁复礼等在乌鲁木齐购得，后又捐至北京图书馆；贝格曼收购文书，流散至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5. 西北科学考查团向达等人在敦煌所获文献，收藏至国家图书馆；6. 苗希甫1928年于敦煌所获文献，藏于国家图书馆；^① 7. 张大千敦煌所获文献，分散至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以上路径中，前三种文献又辗转至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杭州庐江草堂、藤井有邻馆、杏雨书屋等地。

（作者单位：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阎婷婷系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张铁山在研究国家图书馆藏《阿含经》时，曾指出：“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文献（指《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笔者注）是1928年以前东北某县县长苗希甫赴西北旅行，至敦煌千佛洞朝拜佛迹时，向寺中道士求索的。1933年曾在故宫午门上展览过。1936年归方雨楼先生收藏，后归入北京图书馆，但何时归入北京图书馆，已无案可查”，参见张铁山：《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第28页。